

全球化时代语言治理的后现代转向

郭书谏, 沈 骑

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语言治理是当前语言规划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也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议题。虽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仍缺乏对语言治理原则与框架、理论与实践的深入探讨和案例分析。本文回顾了语言治理作为概念,在语言规划理论发展中的新内涵。与此同时结合理论,聚焦美国官方的语言立法文件和科技公司的社区语言规范,从多重视角探讨全球化时代语言治理实践的后现代转向及其影响。从批判的视角观察,美国语言治理的后现代转向的理论目标和实践结果存在矛盾性。在未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要全球化语言治理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 语言治理;语言立法;美国语言规划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22)01-0001-05

Abstract: The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s one of the emerging fields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for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capacity of language governance. Although the language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been in the spotlight, but existing studies lack in-dep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scussions. Based on the language legislative documents in the US, community guidelines of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current language governance theories, this paper reviews language governance as a concept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We explore the postmodern turn in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postmodern turn in language governance is contradictory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hinese solutions to language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ill lea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governance; language legislation; US language planning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22.01.021

1. 从语言规划到语言治理

从早期的语言本体规划,到语言地位规划,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语言资源观(沈骑 2019),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迄今已有60多年发展历史。早期的语言规划学科多从国家政府层面出发,通过立法和政策确立国语、规范语言使用和规划国家语言教育方针。以颜诺(B. Jernudd)和内乌斯图普尼(J. V. Neustupny)为代表的语言管理学派认为:语言规划中不同的参与者和社群都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关注语言管理的不同层次、维度和过程(何山华、戴曼纯 2016: 37),这种多场域、不同主体共同参与的“语言管理理论”丰富了早期语言规划理论的单向度和政府主导特征。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语言规划由此开始超越传统以国家作为规划主体的范式(沈骑、康铭浩 2020: 65)。王春辉(2020:30)认为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了语言治理的多元

主体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和双向互动,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王玲、陈新仁 2020:82)。也有学者认为语言治理是指“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威人物或机构对所辖领域的语言现象(如语言学习、语言推广和语言使用等)予以研究、规划、指导和管理的过程(process),其核心还是语言政策或语言管理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张治国 2020:72)。这一观点更加接近早期语言规划的传统看法,认为语言治理应该以政府或者权威人物为主导。

在界定“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三个概念的发展历程和内涵变化时,应回归特定历史时期的语境,考察治理主体(政府和权威主导还是多方参与)、治理方式(显性的政策规定还是隐性的政策实践)和治理对象(以语言本体的治理为目标,还是以语言作为手段治理社会)。目前学界尚未对语言治理内涵中的上述三点达成一致意见。既然20世纪80年代以颜诺、内乌斯图普尼为代表的语言管理学派已经在语言规划的基础上发展了多主体、多维度和重视过程的语言管理理论,语言治理作为21世纪以来新的理论概念,其内涵应

该更加反映新时代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时代的新特征和理论视角差异。

英文文献中,“语言治理”存在 language governance、language of governance 或 language and governance 等多个表述。西方学者理解的“语言治理”多以语言为工具的治理,而不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治理(王玲、陈新仁 2020: 84)。这一论述揭示了“语言治理”理论可能存在的新视角:语言可以成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治理语言的过程,也是在治理与语言活动密切关联的身份认同、民族性和经济关系。正如 Tollefson (2002:87) 提出的“话语的治理”。从将语言作为治理对象,逐步将语言作为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手段转变,将语言作为交际过程,形成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力,影响社会结构。从内涵变化来看,语言规划、语言管理和语言治理三者不仅是先行后续的历时关系,同时也是不同的理论视角。“语言规划”体现了现代的、单向度的、以政府作为决策中心的理论体系,这一视角代表了理性、进步等知识精英主观改造语言和社会的诉求。“语言管理”体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理论,逐步建立多主体、多维度、多场域的理论体系,这一视角强调了个人语言权和政策施行过程的对话性。“语言治理”体现了后现代的、反传统的、批判的理论视角。因此,在研究语言治理的个案和具体情境时,不仅应该对政策文本等显性层面开展描述性(descriptive)和阐释性(explanatory)研究,同时也应该探究文本之外的隐性进程,考察不同主体的参与角色和互动关系,乃至采取批判视角审视政策主张和实践结果的差异。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以美国当代的语言治理作为案例,对“语言治理”的多元主体性、互动性和批判性加以考察。国内对美国语言规划的研究成果已然丰硕。蔡永良(2002:200)认为,美国的语言政策始终是为确立和维护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打击和排挤其他语言服务的。以褒扬英语、排贬他语为特征的美国语言文化及其支撑的语言政策构成了一个能融化、消解所有非英语语言的熔炉。陈美华、陈祥雨(2017)认为美国历史上通过多次唯英语运动,实现独尊英语、排斥其它语言。陈新仁(2017:25)认为美国语言政策具有几个特点:“第一,极力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第二,打击排挤其他语言,特别是印第安语;第三,美国的语言政策更多地是以隐性的方式出现的”。妥洪岩、田兵(2015:119)认为,“通过编写标准美国英语,建立公立学校,提高民众教育水平的同时,使语言歧视制度化。美国对语言的治理是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语言治理培养适合美国社会所需的共和国公民”。以上成果从不同层面考察了美国语言规划的目标和特征,但仍存在几点有待商榷:首先,前述研究中“美国”是一个统称的地域概念,是否可以从更为多元的主体(官方和非官方)展开具体研究。第二,上述文献多基于历史上美国的语言规划,在近 30

年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美国可能产生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第三,前述研究多以概念思辨方式为主,回归法律文本和政策实践不多见。

本研究考察了政府官方关涉语言的立法文件和非官方(科技公司)的语言使用社区规范,选取 1991 年作为研究起始的年份,自此冷战结束全球化开始。同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谷歌、亚马逊等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相继出现,这些科技公司发布的语言社区规范文件是非官方语言治理的重要政策文本,对互联网中的语言治理发挥作用。

2. 官方的语言治理:语言立法文件

我们通过美国国会立法法案数据库 Congress.gov 查阅 1991 年以来的立法文件,以 language 作为关键词检索立法内容,共计 242 项。通过阅读分析,据不完全统计,自 1991 年以来内容涉及语言的 242 项立法文件中,共有 8 项法案通过正式实施(参见表 1)。

表 1. 有关语言的美国立法法案

法案编号	法案名称	主要内容
S. 2367	21st Century Language Act of 2012 《2012 年 21 世纪语言法案》	将 lunatic 一词从联邦法律中删除
S. 1338	A Bill to Require the Accreditation of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s, and for Other Purposes 《英语培训项目认证法案》	要求对英语培训课程进行认证
S. 1338	Plain Writing Act of 2010 《平易书写法案》	要求政府信息和服务中必须清晰(clearly)地写作
H. R. 4238	To amend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Organization Act and the Local Public Works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Act of 1976 to modernize terms relating to minorities 《能源部组织法案》和《1976 地方公共工程资本发展和投资法》有关少数民族的条款现代化的修正案	在联邦法律中删除 Negroes, Spanish-speaking, Orientals, Indians, Eskimos, and Aleuts 并以更加适当的词代替
H. R. 4766	Esther Martinez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Preservation Act of 2006 《2006 年美国原住民语言保护法》	采取一系列措施,资助保护原住民语言的项目
S. 193	Broadcast Decency Enforcement Act of 2005 《2005 年广播礼仪执法法案》	提高处罚以禁止在广播中使用淫秽、不雅和亵渎性语言
H. R. 1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2001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确立了英语不流利的移民学生的语言支持计划;确立了对原住民学生的英语支持计划
H. R. 6	Improving America's Schools Act of 1994 《1994 年改善美国学校法案》	制定了双语教育、语言强化计划、语言习得计划等一系列政策
H. R. 4312	Voting Rights Language Assistance Act of 1992 《1992 年投票权语言援助法案》	延长了选举法中对某些语言少数群体的语言援助规定时限

以上 8 项有关语言的立法文件中,H. R. 1 和 H. R. 6 是系统的关于教育方面的法案,其中一部分进行了语言教育规划。H. R. 4312、H. R. 4766 和 H. R. 4238 三项法案旨在保护少数民族裔的语言权利。S. 2367 和 H. R. 4238 两项法案确立了立法语言中不得有侮辱、淫秽、不雅等限制性表述,S. 193 法案提高了广播语言违法处罚,S. 1338 规定了政府服务和沟通中必须使用平易英语。

从上述法案文本,可以归纳出近 30 年来美国官方语言立法的若干原则:1) 维护种族平等,删除法律文本中有关种族歧视的词语,以情感色彩较为中性的词语替代;2) 保证教育过程中不同语种间公平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以此促进教育公平。倡导双语教育(本族语+英语),支持原住民和移民的英语学习,设立资助项目保护原住民语言;3) 提高错误语言使用的违法成本,治理媒体中的不良用语。

除上述成文法之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会始终存在着以共和党为主的、代表“英语唯一”(English-Only)的立法诉求,曾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确立英语地位的法案。1995 年 Emerson 提出了 H. R. 123《英语授权法案》(Congress. gov 1996),旨在确立英语作为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虽然该法案在众议院表决中以多数通过,但未曾进一步成为成文法。2005 年 King 再次提出了《英语语言统一法案》(Congress. gov 2005),但该法案没有进行表决。2019 年这一法案又一次被提出(Congress. gov 2019)。20 世纪 90 年代的共和党领袖、总统候选人 Bob Dole 曾公开表示“英语是我们仍然使用的跨越种族和文化的语言,是宪法的语言……是我们需要语言的胶水,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英语应该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Crawford 2000:35)。

近年来,一系列语言歧视(language discrimination)法律诉讼中,执行“英语唯一”的公司都受到了判罚。在 2000 年的案件中,被告公司是一家长途运输服务商,要求雇员执行“英语唯一”的政策,最终法院判决赔偿 70 万美元(EEOC 2000)。在 2020 年的案件中,零售商 Albertsons 要求员工在工作时间只能说英语,遭到 EEOC 起诉后和解,赔偿 21 万美元(EEOC 2020)。

尽管在联邦立法过程中,“英语唯一”的主张没有获得多数支持,各州政府仍然在实践中试图强化英语的地位和使用。以加州为例,以 Proposition 227 为代表的一系列州政府和教育部门提案,在实践中依然强化了英语教育的地位(Crawford 2000:113)。

3. 非官方语言治理:以新媒体的社区语言规范为例

除官方立法之外,公司、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主体采取治理措施改变语言实践的行为,属于非官方的语言治理。这一范畴非常广泛,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美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社区规范文本(Community Guidelines)作为案例进行研究。科技公司的产品(如脸书、谷歌等)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步成为数以亿计用户使用不同语言的社区,成为一种新媒体。这些公司制定社区规范,治理语言在各自旗下社区的使用,对数以亿计用户的语言使用施加影响。我们选取了 7 个重要的科技公司(推特、脸书、Quora、谷歌、Youtube、亚马逊和 Snap)作为样本,分别代表了互联网社交、娱乐、问答、消

费购物、即时通讯等不同的场景。本研究检索、分析、编码和研究这些公司的社区规范文件,结果见表 2。

表 2. 科技公司语言治理规范的编码

	推特	脸书	Quora	谷歌	Youtube	亚马逊	Snap
terrorism(恐怖主义)	✓	✓	✓		✓	✓	✓
sexual content(色情内容)	✓	✓	✓		✓	✓	✓
abuse/harassment(虐待/骚扰)	✓	✓	✓	✓	✓	✓	✓
hateful conduct(仇恨行为)	✓	✓	✓	✓	✓		✓
suicide or self-harm(自杀或自残)	✓	✓			✓	✓	✓
illegal or certain regulated goods or services(受管制的货物或服务)	✓	✓	✓		✓		✓
privacy(隐私)	✓	✓	✓		✓		✓
non-consensual nudity(非自愿的暴露内容)	✓	✓	✓		✓		✓
platform manipulation and spam(平台操纵和垃圾信息)	✓	✓					✓
civic integrity(公民正义)	✓	✓			✓		✓
impersonation(冒充他人)	✓	✓			✓		✓
synthetic and manipulated media(合成或操纵媒体)	✓	✓			✓		✓
copyright and trademark(版权商标)	✓	✓	✓		✓		✓
advertising(广告)	✓	✓	✓		✓		✓
language use(语言使用)			✓				
COVID-19(新冠有关信息)					✓		
数据来源:							
推特	https://help.twitter.com/en/rules-and-policies/twitter-rules						
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standards						
Quora	https://help.quora.com/hc/en-us/sections/360000092866-Best-Practices-and-Policies						
谷歌	https://about.google/community-guidelines/						
Youtube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9288567?hl=en						
亚马逊	https://www.amazon.com/gp/help/customer/display.html?nodeId=GLHXEX85MENUE4XF						
Snap	https://www.snap.com/en-US/community-guidelines						

通过以上社区规范文本,我们归纳了四点特征:第一,语言使用提倡多语主义。除 Quora 对于语言的使用具有明确的规定,要求用户在英文社区只能使用英语进行交流,其他公司并不限制在平台中使用什么语种,各个社区中普遍存在多语实践(multilingual practice)乃至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

第二,语言治理的规范性不再是政策重点。语言使用个体化、超语言化和多模态化,包括 emoji 等丰富的新的语言形态在社交媒体中得以创造。语种之间、语言和图片之间、语言和符号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

第三,语言的内容治理重要性凸显,禁止性条款包括恐怖主义、仇恨、骚扰、性、欺诈、贩卖非法商品、操纵选举、隐私信息、版权等方面。由于联邦立法文件中,关于语言内容的治理集中于立法语言和广播内容,对社交媒体等互联网的语言使用缺少相应规定,相关发表内容受到用户协议和社区规范的管辖。

第四,各大科技公司以社区规范文件作为依据,是语言内容治理的主要执行者。2021 年 1 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脸书及推特账号由于“存在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被永久封禁。对比之前的重要判例,1964 年苏利

文诉《纽约时报》案中,媒体中相关内容是否构成诽谤罪是由当地法院及后续最高法院裁决。在特朗普脸书和推特账号封禁过程中,对于内容是否违规由各大科技公司判定,成为事实上互联网语言内容治理的执法者。

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规划理论不同,全球化时代非官方的语言治理实践中,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重要性降低,不再追求语言的“官方性”“规范性”和“标准化”;治理主体由官方逐步向多元主体转变。这些变化体现出全球化时代,语言治理实践的后现代转向。

4. 语言治理的后现代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福柯、布迪厄等理论影响,语言规划学界开始反思语言在社会资本再创造过程中的不平等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主流的、社会精英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受到质疑,被认为“使语言和(相关的)社会不平等固化”(Ricento 2009: 26)。后现代的观点认为,包括母语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不足以应对世界各地许多语言接触环境中存在的复杂多语现象。语言规划是人,特别是精英人群对语言自然使用和演化的不必要干预。因此语言规划过程不应带有价值判断,而应该坚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例如,某人群的语言不够标准,这里标准由谁确定值得商榷。语言规划不应该成为社会精英对美好社会的主观构想,应该警惕这一过程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全球化为语言治理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动,人群的流动性空前增加,社区的多语特征日益明显。一国居民使用多种语言,或者一个地区通行几种语言变得常见,语言作为民族国家建构身份认同的纽带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当代的语言治理实践向后现代转型,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从“英语唯一”转向“多语主义”。与部分观点认为美国历史上“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的情况不同,官方和非官方不再对语言的特殊地位加以规定。具体实践中,在公共场合和互联网中,不再规定使用哪种语言;规定工作语言为英语的企业会受到法律惩罚。

第二,从语言本体的规范性转向语言内容(话语)的治理。语言使用不再具有标准形式,而是存在各种变体,不同语言的边界逐渐模糊,语言和其它符号的混合使用、超语实践等行为日益普遍,承认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和自然演化。

第三,语言作为国家和民族认同逐步转向语言的商品化(Heller 2010)。不再强调英语是英国、美国或者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语言。世界各地多种英语变体得到承认,形成“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①)的话语体系(Bolton 2005)。受益于学习英语的经济效益和工具价值,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吸引更多的使用人口(Guo et al. 2020)。英语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语言,不

再设立一个组织负责语言传播,而是由各国不同的企业和个人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以新加坡为例,一个建国以来,华人和汉语具有90%使用人口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英语在当地商品化程度加深,凸显工具价值,华人第三代第四代移民普遍向英语转用(Kwan-Terry 2000; Stroud 2011)。“新加坡英语”成为了英语变体的一种,逐步建构了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

语言规划批判理论(Tollefson 2002: 4)虽然批判了传统的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但对于具体政策实践缺乏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美国语言治理的过程中,事实上将一系列本属于民族国家政府的语言管理职能,让渡给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体,官方采取中立的态度,对语言的使用和演变不加以干预。

尽管后现代语言规划理论在提出伊始,旨在批判传统语言规划造成的社会资源不平等,目的在于促进语言和社会的公平。然而,实践中并没有实现这一预期结果。全球化的发展使得英语的使用人口激增,语言造成的资源、信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更加凸显(Phillipson 2008)。语言作为公共产品和人力资本,具有天然的网络效应(De Swaan 2002: 253)。当某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越多,学习这种语言对个人带来的效用越大。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当语言作为一种商品参与市场竞争时,具有经济和人口优势的语言天然具备更强的工具价值,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使用者。从理论到实践的南辕北辙,显示出全球化时代语言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和当前西方理论的局限性。

5. 启示

由于后现代语言治理从理论到实践的矛盾性,在研究西方语言治理时,不能轻易采信政策文本和理论主张,而应该以更加批判的视角观察。立法文件等官方政策话语可能成为显示政治正确、减少批评的一种策略,可以缓解了语言矛盾,满足了原住民、新移民等弱势语言群体的公平诉求,在国际社会具备了话语资源和道德优势,更为关键的是语言治理的隐形进程(Shohamy 2006)特别是新自由主义(Piller 2013)驱动的语言传播。

全球化时代的西方语言治理的转型,为当前我国的语言治理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语言本体的规范性边界在哪里,如何确定语言自然变体和官方治理标准之间的政策空间?语言治理研究如何进行政策的价值分析(沈骑 2011)?如何将官方立法和公司组织相结合,进行话语治理,从而实现特定的社会治理目标?互联网空间的语言治理应该遵循什么样的立法框架,政府和公司发挥怎样的角色?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如何从一个中心化的以特定组织驱动,向着去中心化的、个体利己驱动的传播路径转化(郭书谏、沈骑 2019)?是否可能从中国的“汉语”向着“世界汉语”发展(李宇明

2017)? 如何在后现代语言规划理论之外,开辟新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提出语言治理的中国方案? 以上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答。

6. 结论

本文回顾了语言规划的理论发展历程。作为语言规划领域的重要概念,语言治理是全球化时期的语言规划,体现了新的理论内涵。语言治理是多元主体互动,将语言作为途径和手段,以期实现特定社会治理目标。当代美国语言治理,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的重要性降低,不再追求语言的“官方性”“规范性”和“标准化”,治理主体由官方逐步向多元主体转变,显示出系列后现代转向的特征。这一政策转型在过去30年特别是全球化以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商品化”后,英语与特定的民族性逐步脱钩,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成为“世界英语”,发展了各国家各地区的变体。语言治理的后现代转向从理论到实践存在矛盾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探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全球语言治理期待中国方案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参考文献

- [1] Bolton, K. Where WE stands: Approaches, issues, and debate in world Englishes[J]. *World Englishes*, 2005(24): 69-83.
- [2] Congress. gov. Bill Emerson English Language Empowerment Act of 1996[EB/OL]. 1996[2021-7-2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4th-congress/house-bill/123>.
- [3] Congress. gov. English Language Unity Act of 2005[EB/OL]. 2006[2021-7-2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9th-congress/house-bill/997>.
- [4] Congress. gov. English Language Unity Act of 2019[EB/OL]. 2019[2021-7-25].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997>.
- [5] Crawford, J. *At War with Diversity: US Language Policy in an Age of Anxiety*(1st edn.)[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 [6] De Swaan, A.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1st edn.)[M]. Cambridge: Polity, 2002.
- [7] EEOC. Court Speaks: English Only Rule Unlawful; Awards EEOC \$ 700,000 for Hispanic Workers[EB/OL]. 2000[2021-7-30]. <https://www.eeoc.gov/newsroom/court-speaks-english-only-rule-unlawful-awards-eeoc-700000-hispanic-workers-0>.
- [8] EEOC. Albertsons to Pay \$ 210,000 to Settle EEOC National Origin Discrimination Lawsuit[EB/OL]. 2020[2021-7-28]. <https://www.eeoc.gov/newsroom/albertsons-pay-210000-settle-eeoc-national-origin-discrimination-lawsuit>.
- [9] Guo, S., Shin, H. & Q. She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hinese in Thailand's linguistic market: A case study of how language education promotes social sustainability[J]. *Sustainability*, 2020(12): 7344.
- [10] Heller, M.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nguag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0(39): 101-114.
- [11] Kwan-Terry, A. Language shift, mother tongue, and identity in Sin-

- gapo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0(143): 85-106.
- [12] Phillipson, R. The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f neoliberal empire[J].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2008(5): 1-43.
- [13] Piller, I. & J. Cho. Neoliberalism as language policy[J]. *Language in Society*, 2013(1): 23-44.
- [14] Ricento, T.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Policy: Theory and Method* [M]. California: John Wiley & Sons, 2009.
- [15] Shohamy, E, G.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M].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2006.
- [16] Stroud, C. & L. Wee. *Style, Identity and Literacy: English in Singapore*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11.
- [17] Tollefson, J, W. *Language Policies in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M].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2002.
- [18] 蔡永良. 论美国语言政策[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5): 194-202.
- [19] 陈美华, 陈祥雨. 中美语言政策的差异及启示: 官方语言视角[J]. *外语教学*, 2017(3): 7-11.
- [20] 陈新仁. 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J]. *外语研究*, 2017(1): 22-26, 31.
- [21] 郭书谏, 沈 骑. 互联网空间的世界语言活力及其成因[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1): 27-36.
- [22] 何山华, 戴曼纯. “语言管理理论”: 源流与发展[J]. *语言规划学研究*, 2016(1): 32-45.
- [23] 李宇明. 汉语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1-2.
- [24] 沈 骑. 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之维[J]. *外语教学*, 2011(2): 44-47.
- [25] 沈 骑. 中国话语规划: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语言规划的新任务[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4): 35-43.
- [26] 沈 骑, 康铭浩. 面向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64-74, 2.
- [27] 妥洪岩, 田 兵. 社会学视角下的美国语言治理解读[J]. *前沿*, 2015(1): 116-119, 154.
- [28] 王春辉.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29-37.
- [29] 王 玲, 陈新仁. 语言治理观及其实践范式[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82-90.
- [30] 张治国. 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72-81.

基建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治理视域下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20BY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郭书谏,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语料库, 语言规划。

沈骑,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语言教育规划, 语言安全。

责任编辑 罗逸文